

第六章 結論

和碩特蒙古的演變及蒙藏關係

祭祀是帶有宗教色彩的風俗，它是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所累積下來的結果，祭祀也是民族群體心理的一種表現形式，所以，從祭祀的角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民族，也能探討民族如何影響民族文化的產生及形成。民族文化的形成離不開地理環境的因素，在特定的環境之下所表現出的民族心理會有所不同，以青海蒙古人而言，遼闊的高原及長期的遊牧生活是蒙古人生活的特色，是構成青海蒙古人與其他民族之間不同的民族心理的要素之一。筆這認為蒙古人心理與祭祀習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相互影響、作用而得以發展及延續的。

遼闊的高原是青海蒙古人賴以生存及發展的搖籃，它為蒙古人提供了一個特別的、隔離的地理環境，進而讓青海蒙古人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特徵。蒙古人的祭祀活動就是民族外部表現，蒙古的祭祀活動除了其他民族也有的之外，比較特別的就是有別於他民族的祭天地日月的活動，如祭火、祭敖包、祭日月山川等，這些祭祀活動逐漸發展後，最終變成了蒙古人獨特的風俗習慣。由於蒙古駐牧比較分散，經常移動，所以彼此的聯繫較薄弱，再加上以前的生產方式比較不進步，讓游牧經濟有很大的不穩定性，所以只要遭遇到天災或人禍的襲擊，牧民往往沒有反抗的能力，只要一次的天災或瘟疫就能讓牲畜大量死亡、經濟嚴重衰退。在這樣的環境裡，蒙古人認為生活就是上天的恩賜，把大自然視為神聖的崇拜，所以，崇拜自然就變成了蒙古人心理重要的特徵，祭日月山川、祭火等祭祀活動，就被視為這種民族心理的表徵，並得以延續而成為習俗。

青海境內五分之四都是高原，它具有典型的大陸型氣候，乾燥、少雨、寒冷、

缺氧等特徵，自從漢代通西域之後，青海一直是中央政權想要控制的地方，對於青海的控制與否，就關係到中央的帝國疆界，自明代中葉以後，俺答汗突破明的防禦，將其部落移至青海之後，陸續有許多蒙古的部族也遷徙到青海，如和碩特部及其他蒙古部族。清初因避難移居至青海的回族，加上原本就居於青海的藏族人，不同的民族交織出青海複雜、多變的民族關係。

當時進入青海的蒙古部落，在軍事力量上都十分地具有威脅性，從俺答汗到固始汗都極力想與藏傳佛教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，以利自身勢力進入青海及西藏。當時的和碩特部也需要鞏固本部的勢力，所以與黃教結盟，以自身的武力優勢，暫時地統一了青海的蒙古各部。固始汗應藏傳佛教格魯派請求，用武力征服了其他教派之後，助格魯派取得西藏教派中的領先地位；由於他本身是蒙古的統治階級，所以底定西藏後，在藏區建立起了蒙古的統治政權，不僅包括西藏，就連東部的康區及東北的青海地區也都囊括在固始汗的統治之下，他因而成爲統治全國藏區的一個蒙古汗王。不過在經濟及宗教方面的權利，固始汗還是將其送歸格魯派所有，相對也確定格魯派在藏傳佛教中的優勢地位。

固始汗率和碩特部進入青海之初，同來的還有其他幾個蒙古的部落，當然以和碩特部的勢力最爲龐大。固始汗在進據藏區之後，也採取了一連串的政治及宗教措施，除了建立蒙古在西藏的地方政權之外，也注意到青海地區的優勢，他認爲以青海的地理位置能夠抵抗從北方而南下的其餘蒙古部眾，所以分其子住牧，在青海生根，擴展自己的力量。

此時，他也注意到在關外興起的後金勢力，所以與清廷來往，而清建立之後，他更遣使往北京，意欲與清建立良好關係，清帝也對固始汗有了回應，賜予封號；此封號等於昭告了青海蒙古的地位，不是由宗教領袖所封，而是清政府所封，和以往的地位不同；也等於清政府承認了固始汗是有封圻的汗國君長，並讓其能維持封圻內的秩序，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義，和宗教上的冊封意義是大不相同的。當時的清廷想利用固始汗來安定青海，以清政府的力量而言，當時還無力顧及青海與西藏，所以間接承認固始汗的地位反而有正面的幫助，只要固始汗聽命於

清，對清廷來說就是穩定邊疆；對固始汗而言，除了與格魯派的結盟外，他也相當需要清來作為力量的後盾，進而鞏固自己在青海的勢力。在種種的聯合下，固始汗為青海蒙古開創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新紀元。

從清廷的角度而言，滿人的傳統薩滿信仰是一種相信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，在社會的發展階段上，已經不能夠滿足統治階級的需求，所以他們也需要有一個有力的宗教力量，因此，清代的統治者積極地籠絡藏傳佛教，也帶有自身利益的考量；其次，清廷也想利用藏傳佛教來作為安定蒙古各部的武器，鞏固自己對於蒙古的統治，因為漠南蒙古各部已在順治年間歸降，對清廷而言，只要蒙古各部都歸降自己，反對清廷的勢力就愈小，同時也能夠有更多精力去處理其他的反動力量，進而促進自己的統一大業。

清初的羅布藏丹津事件正好給了清廷這樣的機會，趁機收回清廷控制青海的權力。平定羅布藏丹津之亂後，清政府下令規定青海藏人各部要直接受地方各級政府的管理，且派員清查戶口，劃定地界，並授以藏人部落首領千百戶等職位，統領當地的藏人部落，不再隸屬於青海蒙古各部，藏人也算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。蒙古人更受到盟旗制度的影響，被劃歸在固定的牧地之中，自此成為清廷控管之下的地區。

平定青海之後，年羹堯上奏《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》，對當地的軍事、經濟、政治、宗教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及限制，這對青海地區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過程，經由《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》，青海蒙藏人民正式列管在清廷的統治之下。當時和碩特蒙古的勢力已漸衰敗，故清廷廢除了和碩特蒙古以青海為中心的特權地位，使和碩特蒙古不再具有政治上的統治地位，另清廷也巧妙地將和碩特蒙古的會盟置於清廷政府的監督之下，由清廷來控制及管理。此後，和碩特蒙古的勢力一直無法恢復如先前一般，也未能再形成威脅清廷的一股力量，清廷用祭海來籠絡蒙藏民族的策略算是達成目的了。而在青海地區原受和碩特蒙古統治的廣大藏民被清廷直接管理後，脫離了青海蒙古的壓迫，也有助於藏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這對青海的民族關係來說是一次大轉變的過程。

清中葉，青海藏人休養生息後，人口的增加增加了經濟上的需求，所以不斷地進逼到蒙古人游牧的草原地區，造成蒙藏間爲了牧地而開展的紛爭，也造成青海社會的動盪不安。經過近百年的紛爭後，藏人終於被清廷允許在青海湖邊放牧，再度移居青海湖邊的藏人被納入清廷的管轄之中，但得到較佳牧場的同時也代表藏人受到清廷更嚴格管制，得到土地的代價是失去移動的自由。將藏人納入湖祭，並不意味著藏人是被征服的，而是清廷無力將藏人遣回其應屬之地，既然祭海與會盟是同時進行的活動，也是清廷宣導政令的場合，所以進入蒙古原屬之地的藏人也應該參與，但一起會盟也不表示蒙藏間是平等的，因爲藏族加入湖祭的時間比蒙古人晚，所以地位也比較低。

河南的藏族對河北的蒙族反覆不斷地攻掠，讓青海的蒙古人長期處於一種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之中，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，外部藏人的武力攻擊與內部蒙古人的階級問題交錯在一起，造成蒙古人的社會呈現矛盾的狀態。由於蒙古王公對蒙民的壓迫，讓蒙民有時會偽裝成藏民搶奪蒙古王公，反而造成社會的動亂，身份階級問題不能得到舒緩，以至於讓整個蒙古族的社會呈現衰退狀態，旗與旗之間的隔絕、社會矛盾及經濟上的衰敗也讓生存的條件更惡劣，青海蒙古人失去了內聚的力量。

祭海與會盟除了維護中央體制的統治外，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管道，讓本民族與它民族之間能夠有相互來往與了解的機會，道光年間自蒙藏共同會盟開始，蒙藏間對牧區所有權的直接衝突和糾紛也大爲減少，因此對於青海地區的穩定與發展，具有一定的作用。透過異民族間的交往，也間接地促進彼此之間的經濟交流，並增強民族間的聯繫。另外，趁著舉行這種大型聚會的機會，各地的商賈都會前來，與當地許多民族交流，也促進了民族貿易的發展，有利於青海地區的發展與建設；青海的蒙藏人民自古以來以游牧爲業，爲了便於生產，居住的相當分散，以這樣的形式集會，也有利於蒙藏人民間特色文化的交流及發展。

清廷藉由青海湖神的崇拜與祭祀，讓和碩特蒙古實質上也臣服於清，此後的一百多年間，青海蒙古王公及後來加入湖祭的藏族千百戶，對清廷始終是忠心耿

耿，成爲清廷在青海的屏障，即使面臨了清中葉的回民反清，他們的態度也始終站在清廷這一邊，甚至組成團練幫助清廷對抗回民，由此可見，清廷利用祭海作爲拉攏蒙藏民族的手段是成功了。

辛亥革命後，建立民國，不管是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都無法應付當時國內外混亂的局勢，自然對於青海無力西顧，這樣的局勢給了穆斯林馬家興起勢力、擴張地盤的機會。就算是當時在青海擁有勢力的馬家，也認爲要拉攏蒙藏民族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沿用前朝的祭海儀式，既可以省力又可以輕鬆地達到目的，所以直到 1949 年前，祭海的儀式都持續舉辦，且一年比一年還盛大。中央政府於每次祭海時都特別派專員前往青海參加典禮，如 1932、1934、1936、1940 等年，表現出對青海蒙藏民族高度的重視感。

祭海儀式在清代是中央與地方勢力的平衡方式，滿人藉由祭海的活動籠絡青海蒙藏民族，雖然清末以來，在青海的蒙藏力量逐漸勢微，但是對於當時的省內情勢，穆斯林首領馬步芳還是需要得到蒙藏首領的支持，以維護自己在青海的權力；國民黨也需要蒙藏的力量，以鞏固西北的邊防。因此，青海的蒙藏人民一直處於中央政府與當地勢力的拉鋸戰之中，成爲兩方勢力所利用，但是，儘管他們的處境一直在夾縫之中，卻又受到兩方的拉攏，在如此奇妙的平衡之下，祭海的儀式活動成爲解決這種尷尬的獨特方式。

湖祭對青海蒙古人的影響

青海蒙古在元、明、清三代中扮演了西藏與中央政府間的橋樑角色，所以青海地區的民族對於中國西北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，隨著青海地區納入清廷的管理之下，青海地區的民族演變也隨著清廷的局勢而有不同的發展。筆者認爲從湖祭的角度出發，雖然它與蒙古人的關係密切，但實際上卻是負面的影響大於正面，

特別是在青海蒙古被盟旗制度所約束之後，湖祭成爲清政府控制蒙古人的一種手段，不得離開原有封地、不得相互侵占、不得私下會盟，在種種嚴格的規定下，青海蒙古人逐漸喪失原有的自我意識，成爲清廷掌握下的屬民。

青海蒙古的社會也因爲人口、牲畜的流失，造成經濟衰弱，一般百姓謀生不易，逃亡、流離失所的牧民所在多有，社會功能無法正常運作，當然就影響社會的發展。湖祭的舉行，對青海蒙古王公而言，是宣告政治地位的一種儀式；但對蒙古王公的屬民而言，就成爲一項沉重的負擔，牧民必須要在常態的勞役之外，增加祭海所需的勞役，對已經吃不消的牧民而言，又是更沉重的壓迫。所以社會發展一直停滯不前。

故筆者認爲湖祭是弱化青海蒙古人的關鍵政策，也是造成青海蒙古積弱不振的首要影響。雖然表面上看來，蒙古擁有較其他民族高階的地位，但和固始汗時期比較起來，實際力量不增反減；時間一久，青海蒙古就失去了與清抗衡的力量，最後不得不臣服於清廷，甚至清中葉以後，還必須仰賴清廷的保護來對抗青海藏人的力量。青海蒙古的實力衰亡可見一般。

另外，青海蒙古由於宗教信仰、牧地交錯等原因，受到藏文化的影響很深，有些地區甚至漸漸地接受藏文化，這種趨勢至今日也還看得出來，筆者前往當地時，發現到許多人的身份是蒙古人，卻不會說蒙語，只會說藏語，名字也用的是藏人的名字。兩個民族的文化勢力角逐，會隨著時代及環境的演變作調整，這是生存所必要的方式之一。不過筆者認爲，較特別的一點是：蒙古以強勢武力進入青海地區，反而被藏人宗教而影響，逐漸藏化。

湖祭對青海藏人的影響

由於青海藏人社會受到清廷政策影響，得到適當的休養生息，所以社會發展

較爲穩定、進步，和蒙古人相反，藏人在羅布藏丹津事件中扮演得利者的角色。藏人利用社會發展的穩定優勢得到清廷的承認，湖祭就是清廷承認的舞台，清軍無法驅逐藏人的力量，只好讓其加入湖祭，承認藏人在湖祭中的地位，這是折衷的方式。藏人從蒙古人的屬民，轉變成爲能與蒙古人一起參加祭海的民族，這對藏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。

湖祭對中央政府的意義

湖祭本爲青海蒙古人的活動，自清廷控制青海地區以來，清廷便將其意義轉變成替中央政權服務的一項儀式；祭海本爲蒙古崇拜信仰的儀式之一，不定期、不定點，是蒙古內部的一種社會網絡機制。但自清廷訂下定制後，祭海成爲控制蒙古人的一種手段，清廷制定祭海的時間、日期、儀式內容、參與人員等等，結果變成蒙古人不可違反的規定。筆者認爲祭海對蒙古人而言，失去了原有的意義，反而是對清廷政府，提供了一項柔性統治的方式，既省力又可達成目的；清廷政府利用祭海儀式處理完蒙古問題之後；接著，也利用祭海儀式來處理藏人的問題，讓藏人的反抗力量也在祭海儀式中逐漸消除，達到維持青海地區安寧的目標；故祭海儀式對中央政府而言，得利的部分絕對大於青海地區的各民族。

祭海儀式的有效性在有清一代得到證實，所以，民國以來，不管是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也都持續的舉行祭海；特別是民國初年，軍閥割據，國內局勢混亂，此時，祭海就成爲有效的政策。它一方面能夠維持馬家的地方政權；另一方面也能籠絡蒙藏民族首領的心，在多方得利的情況下，祭海又再度變成爲中央政權服務的一項儀式；後來參加的民族不只蒙藏，甚至還多了穆斯林及漢人。筆者認爲：自清代成功的將祭海儀式轉變爲自身政權服務後；國民政府也沿用了這樣的統治工具，平心而論，祭海的確達到了這樣的效果；中央政府將專屬於蒙古人的活動，

變成了控制青海地區各民族的一種特有手段。